

传统文化谱系与现代审美变革 ——浅析阿库乌雾《混血时代》中的动物意象

孙阿木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阿库乌雾的动物意象叙事以现代性审美对传统文化意象进行转译和重铸,让传统谱系的文化符号从意指单薄的传统原型意象转向现代流动多变“镜像”,对族群历史记忆(传统遗产)和现实个体遭遇(都市生存)进行了多重的投射,实现了传统审美符号与现代经验情境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这种意象策略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意象由抒情性转向叙事性的现代性变革,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都市写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阿库乌雾;动物意象;混血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3-0086-07

Traditional Cultural Pedigree and Modern Aesthetic Changes: an Analysis of the Animal Image in *the Mixed-blood Era* by Aku Wuwu

SUN Amu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Aku Wuwu's narration of animal image translates and recast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image with modern aesthetics, which makes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raditional pedigree change from the dry traditional prototype image to the modern multidimensional and changeable "mirror image", and projects the historical memory (traditional heritage)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al individuals (urban survival) in multiple ways, realizing a mutual-inspir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esthetic symbols and modern experimental situations. This kind of image strategy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mage in minority literature from lyricism to narrative modernity, and also provides many models for the urban writing of minority literature.

Keywords: Aku Wuwu; animal imagery; *the mixed-blood era*

少数民族文学中包含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比如雄鹰、大山、森林、草原、斗牛等,这些承袭性意象和传统空间息息相关,内在意指具有稳定性和约定性,积淀着民族文化的记忆,体现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和审美心理。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城镇化和都市化运动的推进,现代空间加速建构,传统空间里的文化符号遭受冲击和破坏,空间组成元素受到结构性的遗落。少数民族在文化和精神上失去了大自然的参照和依托,一些由大自然提供支撑和参照的精神文化系统陨落了,分解了,变成支离破碎的东西,家园被降格为单纯的自然风景,或者异化为旅游商品。因此,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一个课题是,怎样处理这些传

统空间中的意象遗产,从而实现民族性文化在现代诗歌中的延续和发展?怎样实现这些自然意象和现代都市空间的审美对接?在一个空间性超越了时间性的“共时性时代”,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空间意象能否在现代空间里仍然拥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与都市意象共生,形成对人与自然现代整体境遇的参照?

在世界文学中,出现过许多经典的动物意象,比如雪莱的云雀、济慈的夜莺、布莱克的老虎、里尔克的豹子、马拉美的天鹅等等,它们是诗人精神领域的代言人。而在现代异化世界,在作家笔下出场的常常是负面的变形的动物意象,比如卡夫卡的甲虫、爱伦坡的猫、尤奈斯库的犀牛、马尔克斯的猪尾

男孩等,作家让动物扮演人的角色,从一个人类社会的旁观者视觉去观照和反思现代文明。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那里,动物意象常常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或者图腾,或者体现着族群传统文化中的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或者承载着某种道德力量。当整个传统空间的自然象征体系崩溃之后,它们因为单一的内蕴在现代文化语境里迅速濒危和消失了。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于2015年出版的《混血时代》中,诗人抛弃了早期诗歌中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动物意象如岩羊、雄鹰等,而选取“审丑”类的负面动物意象,来折射现代世界和人类的困境。他的动物意象经营上,主要分为三类:自然野生类(如子牙、蛇、巨蟒、大禽、野蜂等)、虚构复合类(也可以称为心灵造像或者意象的变异,如雨蛇、熊人)和器官骸骨类(如骨头、翅膀、鳍、鳞片等)。《混血时代》中标题中直接出现动物的诗篇共19篇,而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意象约有100多处,出现86种动物。这些动物形象各异,但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性,并且多为负面性或戏谑性,这些动物意象在城市空间意象中的出场,增加了诗歌的力量感,形象感,既映射着民族性的记忆,又有后现代性的寓言色彩。诗人以复杂的多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诡异的充满现代精神的动物意象,给予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都市书写带来诸多启迪。

一、“翅膀”:困境与突围的策略

翅膀意象是《混血时代》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器官之一,约40处,也是诗集中少有的具有正面感情色彩的意象。翅膀自古承载着人类渴望天空,渴望自由的梦想,隐喻着精神腾飞和自我超越的愿望。诗人从逝去的山鹰、雄鹰、大鸟等身上提取标志性器官——“翅膀”入诗,以“翅膀”为核心意象,建立了关于翅膀的一系列意象群,如“羽毛”“飞”“大禽”“翅羽”等,这些意象承载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寄托和人文理想,投射着民族文化突破和腾飞的憧憬。

清晨,露水从鸟儿的翅膀上滑落,打湿我的脚印,纯属意外。但我深知:有一群人终身居住在树叶间,冬季,就从每一条纤细的叶脉深入!……把桑叶织成柔丝,我的蚕蛹注定没有足够的食物。微风总是在家乡的树叶上寻觅最后一粒果子,那寂静的枝干说:你去我的根部吧,那里,泥土的温暖正在渐失!于是,我渴望一根羽毛,唱着忧郁的歌谣四处飘荡。

——《羽毛》^[13]

作为《混血时代》的首篇,《羽毛》以一段非常漂亮的视角和空间转移描写起笔,从“清晨”开始,然后视线转移向“树叶”间,然后从“果子”,联想到了果子的根源“泥土”(这里暗示着某种朴素的秩序伦理原型)。而作为过渡的“寂静的枝干”带有某种萧条、绞架,或者负面的象征,于是视线转移到根部,这里的“空间意识”或者说“方位意识”呈现的是对故土传统精神的熟稔(有别于在都市空间的失去方位/方向感)。这种方位意识贯穿“记忆性的巡游”,同时“那里,泥土的温暖正在渐失”这是田园图景的心灵残像,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现代空间的建构,民族文化或者传统在现代处境的渐渐消亡和凋敝,失去了家园的温暖感。在全诗的隐喻体系中,这里牵扯到熵的问题——泥土的温暖正在渐失是死亡的隐喻。前面“寂静的枝干”“最后一枚果子”“冬季”等萧索、凋敝的负面田园意象反衬出了“羽毛”意象的轻盈、自由、明亮、诗意的忧郁。并且羽毛没有第二热力学中熵的负担(“死亡性”),它仅仅靠漂浮而获得灵动和自由,“宇宙间的空气俨然是为羽毛而生的,羽毛,就在自由的空气里养成了飞翔的品质。”“于是,我渴望一根羽毛,唱着忧郁的歌谣四处飘荡。”^[13]这句诗奠定了整部《混血时代》抒写和情感基调:一种吟唱性、漂泊性、无根、忧郁、却又执着找寻的精神。这种情感中既有对家园凋敝的忧郁,也有都市流散命运的哀伤,包含着理性和克制。“翅膀”或者“羽毛”,寄托着作者对空间的游离和逃逸冲动,某种程度上,这是荷尔德林的返乡冲动的现代指涉和回声。因为在这个即将展开的现代性空间里,方位和时间都陷入混乱,或者说直接被消除了。故乡和未来都被取消了固定的方位感,到处都是“坍塌之声由远而近”^[13]。

渴望从缺乏诗意环境的逃逸,就是渴望通过语言重新寻找家园。由此诗人从“羽毛”联想到“语言与家园”的思考,“大概是文字跟羽毛也有过早期的联姻。……而我以什么去获得我的文字对我片刻的欢悦呢?”^[13]作者将《羽毛》放在诗集开篇,也独到匠心,象征着一场从语言开始的思考和探索旅程。在《混血时代》的建构的象征体系中,羽毛和语言是同质的,因为两者都有着灵动、自由、寻找皈依的特征。

诗中还有大量关于翅膀的描写意象,比如“祖先的翅膀”“智灵的翅膀”“轻盈的翅膀”“毡子温暖的翅膀”,诗人以翅膀隐喻着民族文化曾经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对族群的庇护性意义。翅膀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性的,因而具有抒情性和升华性,

而万物有翅的抒情年代陨落了。现代空间的桎梏和竞争,诗人认识到有翅膀和没有翅膀的深刻区别,“有无翅膀并不重要”暗含的意思即翅膀很重要,诗人甚至以“没有翅膀的动物”“可以飞翔的”来作为判断一个生灵的本质依据。

古老母族文化曾经在灿烂、丰蕴、漫长的历史天空翱翔不止,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母族传统文化呈现出过于古老沉重的一面。这种命运,诗人将之比作了退化的鸟:“甲鸟深沉地:你的种族诞生的时间过早,你的种族的生命浪潮正在悄悄退却;你的种族犯下的罪恶过分深重,你的种族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1]85}(《鸟卵》)。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我们必须重新变成猿猴,再次获得攀缘而生的本领。攀缘是没有翅膀的动物因向往翅膀而练就的本领,攀缘必须借助攀附对象的真实而获得自己生命的真实。

——《攀缘》^{[1]86}

飞翔已经成为历史,丧失了翅膀或者说飞行力衰退之后,便只能靠“攀缘”“逃亡”“游荡”“蠕动”等低级动作形态来求生。为了生存突围,必须使母族文化适应现代文化,这种策略被诗人喻为“攀援”。

一只急于怜悯和拯救,一只拒绝同情和施舍,那颗被她们反复设计和安排中的鸟卵却提前起飞,背弃家园,在飞翔中脱壳,在飞翔中翅羽丰满,在飞翔中变换种姓。(《鸟卵》)^{[1]85}

《鸟卵》是一个关于“飞翔”的略带戏剧性的文化寓言,讨论的仍然是文化预谋和重构的思考。诗人对“飞翔”的感情是双重的,既渴望着“飞翔”,蕴含诗人对诗意家园文化重建的期待和想象。也知道“飞翔”也有代价,“飞翔”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并非一劳永逸的突围和解决。“飞翔,再次成为五谷,成为花蕾,成为毁尸灭迹的火种。”^{[1]14}(《牧歌》)“飞翔”在诗人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人版本的“伊卡罗斯之翼”(The Flight of Icarus)寓言^①。他们插上“蜡和羽毛”做成的翅膀,从父辈“设计”的传统文化的“迷宫”里向外逃亡,从伤痕累累,残破不全的“牧歌”世界向外逃亡,“他们采取背叛,回归,超越(亦即再背叛)的文化策略”实现“民族精神的超越和再造”^{[2]12}“飞翔”由此成了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对传统的背叛,更是超越“牧歌”世界的自我放逐和自我救赎。飞翔也成为“花蕾”:在飞翔中蕴含着许多崭新的激发传统文化现代性复兴和繁荣的因素。同时,因为它的现代性意味,飞翔不再是古老意义上的升腾和超越,而意味着诸如速度、方向、设计等现代理性因素的加入。

“翅膀”意象在“混血时代”中的另一个叙事功用,是通过对“翅膀”的现代审美意义的建构,定位出“人”在现代性空间里的困苦和沉沦。“翅膀”是大地和天空的中介,是精神逃逸的载体和通道,也是上升的梯子,是连接天空与大地之间的摆渡之舟。翅膀也是人类的镜像:它是人类的自我捆绑和生存困境的驳斥和僭越。因为失去“翅膀”从而失去了天空,同时,诗人还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根本就没有长出过属于自己的双脚”^{[1]33}(《大地》)。因此,在这个“混血时代”的空间里,人不仅失去了天空,又脱离了大地,只好永远地寄生在“城市的额头”“城市虚假的石头缝里”,开始了长久的悬置和飘荡。因此,诗人一边急迫地渴望呼唤“大禽”的力量,一边却感到力不从心:

你以羽毛之舟运载日月的重量。你栖落巨石之巅的英姿,早已漫漶不清;可在城市的深巷里,我仍用电脑反复描绘,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却始终排泄不出你当年作为巨石之冠的禽垢”^{[1]150}(《大禽》)

“大禽”是羽毛和翅膀的终极性意象,在这里“大禽”虽然因为古老弥久而身影模糊,但是摆脱了现代肢解,具有完整生命整体。它是对宇宙性的古老生命力量的憧憬和投影,通过形而上的哲思和直觉捕获所塑造的身影。“你以羽毛之舟运载日月的重量”,这种宏大只是灵光一闪,瞬间诗人就被打回了平庸的现实场景:用电脑反复描绘,却早已无力追忆这种漫漶不清的力量形象,诗人虽然有知识,记忆和想象力,但已经无法捕获它内在的魂魄。在一个过于逻辑和辩证的时代,生命与宇宙浑然一体的力量和勇敢,已成为现代瞳孔上模糊而可疑的翳点。于是“一群睿智的蛆虫爬满我的周身”^{[1]150},诗人内部既感到那种遥远的神性和生命的勇敢必然要远去,但是却无可奈何,“飞,与欲飞之间遥遥无期”^{[1]150}。

“翅膀”和“飞”在现代汉语诗歌和少数民族文学中都已经是空洞的公共的符号,而诗人重新为其注入了一种别样的内蕴和象征,赋予它强烈的现代形式感,它们承载着渴望个体自由的梦想。“羽毛”是理想和审美的寄托,对翅膀的渴望,也就是对天空的渴望,渴望重新获得自由。

二、“野蜂”:文化反抗的悲剧性寓意

邹建军教授在《现代诗的意象结构》一书中给诗歌下了一个较全面的定义:“诗歌是以意象化的语言抒写人生内在情思的一种文学体式,它是诗人以敏锐的感觉在生活中发现诗美,并将其兑换为质

感的、精致的、弹性的意象,对诗美加以呈现或暗示,创造出的一种有节奏、意味、张力的完美的艺术结构。”^{[3]2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象是诗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少数民族文学的都市空间审美建构几乎还属于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这种审美建构中,诗人首先面临的是怎样继承传统文化里的民族性精神财富,经过审美经验的淘洗和选择,去提炼和加工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多义的符合审美理想的新物象,从而通过情智的化合或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意识,透视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并蕴含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这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审美转化实践过程。

在《混血时代》中,诗人实践和探索大量的意象审美重构,除了少部分意象带有实验性,内蕴不够凝定,造成了“有意象没有意境”的遗憾外,诗人成功地实现了许多意象的现代性审美转换和提喻,初步建构了一种具有崭新的现代都市品质 and 民族性审美高度糅合的意象。如“大禽”“藁枝”“孑孓”“犬吠”“雨蛇”等,这些意象不再是传统民族文学中单质的家园迷恋诗化意蕴,而于整体结构中承担着完全崭新的功能和意义,阿库乌雾卓有成效地更新了少数民族诗歌意象的意蕴,提升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审美表现力。

在本民族文化向死而生的过程中,阿库乌雾的写作具有某种悲壮感,在面对汹涌的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传统文化在凋敝和失落,诗人深切地感受着切肤的体悟,也苦苦追寻传统文化的重塑和再生之道,他的诗歌充满某种勇敢和无奈,热忱和悲凉,反抗和妥协等复杂矛盾的情感。这种姿态和“野蜂”无疑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野蜂在经典文学语境中充满寓言性,它是野性、蜜(甜蜜/收获/感性)和刺(死亡/攻击/非理性)的矛盾结合体,具有悲剧性和盲目性,以及某种天生的戏剧性。在《混血时代》中,诗人借用野蜂的无惧献身和牺牲自我,同时顽固又盲目等属性,这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有野蜂围困城市,并狠狠蜇那城市盘错的根部。遥远处,野蜂巢,成为崭新的弹壳!”^{[1]173}(《弹壳》)野蜂的特征是强悍,战斗性强,充满攻击性,以弱胜强,具有以小抗大的英雄气概。在“混血时代”的意象谱系中,有许多“文化他附”的弱势而被动的寄生性的意象,比如:藻类、攀援、孑孓、入药的虫类、蠕动的等,唯有“野蜂”具有自源性的力量,动作具有独立性和主动性,能对“城市”施加“蜇”的反抗动作,在这里,野蜂以它野性,舍生而死的品性与“城市”的工具理性、效率、功利

性等现代属性构成了天生的两极。野蜂还是一种精神突围的符号。它和喜鹊、乌鸦、蝴蝶等这些传统自然意象不同,野蜂先天地具有某种反“古典”,反“诗意”的现代性,犹如一朵桀骜不驯的“恶之花”,它的生物学特性散发着野性、危险、活力、威胁、好斗、紧张、纯粹、灵动、艳丽、粗暴、顽强、激动、盲目、喧嚣、寂静,甚至性感等多重审美性。蜂群的生命自足,生存风格强烈,生机勃勃,以蜂巢为中心的完整共同体结构,是这个“去中心化”的,缺少整体性的、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异质的“反动者”和“逆行飞行者”。因此野蜂巢,成为“崭新的弹壳!”,也就常常会给在现代语境中漂泊和思考的诗人带来震动和启示。

就在此时,野蜂巢中忙碌的声音刺伤了我的双眼。^{[1]55}(《碎片》)

野蜂高挂在悬崖上的梦巢,有暗红色的野蜂从夜空飞来。狠狠蜇我的目光,并将自己高贵的尾刺深深地插进我目光的陷阱里,视死如归般放弃自己的毒液,放弃破译生命世界千年密码的权利,却让我却让我的目光在刺骨的疼痛中受孕^{[1]24-25}。(《密码》)

奇异的是野蜂不再用螫针,而是仅仅用声音就能刺伤目击者,这种听觉对视觉的僭越并“施与”伤害之所以可能,其实是由主体内在的激烈的情感所达成的通感。犹如俄狄浦斯自刺双目,是剧烈的内在情感矛盾,而意欲自我剥夺对世界的“观看”,取消了“看”,进入“盲”才能得到某种有意味的赎罪,或者说,通“刺”对“看”的攻击,呈现了对“视觉”的某种批判。因为“看”很多时候仅仅是形成判断信息的搜集,而付诸必要的行动则艰难和复杂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有某种原罪。比如鲁迅对“看客”的劣根性批判。汉语里也充满“视若无睹”“左顾右视”“司空见惯”等包含视觉官能与主体情感分离进而异化的例子。现代信息社会则不断在加深这种看与行动的分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看”是最重要的参与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重要方式,看不仅是立场表达,还是现代商业的重要参与因素,对外观的追逐,深刻地影响着都市的户外景观和文化建构,现代商业繁荣越来越依赖对“眼球”和“注意力”的抢夺,形成所谓的“注意力价值论”。从“玻璃”一直到最新的VR科技,人对视觉欲望的追求已经接近盲目和失控。对“看”的这种敏感,也是诗人对都市情境的警惕和批判。在这些以满足感官而制造出来的科技背后,包含着新的伦理问题和异化危机。“此间,尽可能正襟危坐,手捧荧屏受用远处

发生的灾难。”^{[1]138}(《藁枝》)现代的科技手段夸张地拓展和延长了人的“看”和“听”,通过现代科技信息传播手段,我们感受着来自遥远世界的战争灾难或花边绯闻,对他者悲喜即时性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困境,我们的身份被强化了“看客”的角色,通过看获得了各种分裂的即时性的文化身份:道德审判者,旁观者,窥视者等等。在以“看”为中心的现代权力形态中,“现实”变成了由技术媒介生产出来的可操纵和虚拟的,越来越不可验证的信息编码,到处充满了“目光的陷阱”。我们通过这些科技手段,轻易地获得了“隔岸观火”的权力,成为习惯性的“看客”,在重复刺激下变得麻木不仁,形成了新的人性分裂。人在现代科技文明中失去精神内在的深度和真实感,失去连贯性与整体性。

这样的视觉转化为攻击动作的行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是可以蜇伤那久久受困于悬崖上的野蜂的一声声夺目的惊叹!”^{[1]64}(《苏醒》)“野蜂”在这里蕴含着诗人的某种保持文化本真和传统文化纯粹性的寄托:对于野蜂来说,“生存”就是它们的旗帜,“蜂巢”就是一个在陡峭的岩石上建立起来的生活与信仰同构的殿堂。“野蜂/野蜂巢”从而成了后现代社会某种异质的镜像,“我以祖先的名誉打着锈迹斑斑的旗帜,躲藏在城市的角落,我的旗杆上发不出嫩芽,周遭的人们不再领会我的旗语,我的旗面上爬满时髦的蚊虫,生存犹如一只毒蝎,正在剥夺我成为合格旗手的资格”^{[1]73}(《旗帜》)而对于野蜂来说,“生来就不需要旗帜”,只要它们存在下去,“生命就有了永恒的旗帜”,诗人借“野蜂/野蜂巢”来反观人类的生存时,获得了精神上的领悟和震惊。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这种“野蜂/野蜂巢”的生存模式对于现代文明世界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不可行的,但理性上的认识并不能消解感性上的冲动,因此“野蜂/野蜂巢”就是一种对文化本真和纯粹性理想的寄托与想象,“蜂巢”就成了诗人某种情感的凝聚之处。在诗人笔下,“蜂巢”和“野蜂”和村庄,族人是同义的:

而在遥远的悬崖绝壁上,那寒冷而喧嚣的蜂巢里,千千万万的蛹虫等待着插翅翱翔,并决定不再回望,仿佛曾经生养我的山寨,有千千万万的新生儿,还在母亲的怀抱中就开始渴望:早日逃离干瘪的母乳的木屋和干涸的母语的河床^{[1]24-25}(《密码》)

诗人通过“野蜂”看到了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性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焦灼的情绪。有评论认为,这种悲剧意识“与族性执着的追求密切相关……现代性的家园失落的焦虑,对彝族文化的深爱,现实中

彝族、彝文化的边缘性、次级性,族性文化回归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的成分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本身就内含着相当强烈的冲突性,尽管彝族诗人们奇迹般地从中提炼出了温暖的抒情基调,但仍然不能完全化解困惑、挑战甚至毁灭的冲动”^[4]。

阿库乌雾从民族文化和现代性的思考中,形成了个人化的隐喻式叙述,里面投射着诗人的核心情感和态度,它蕴含着诗人的个人经验、记忆和精神秘密。诗人运用的动物意象策略之一,是选取那些具有后现代审美特征,近乎负面的,微小的昆虫类意象。当彝民族的强悍的力量之美,开拓新世界,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所对应的雄鹰、龙、支格阿尔等传统文化符号被祛魅,变得能指稀薄之后,“野蜂”是诗人冷静审度民族的文化命运后,新建构的一个精神符号。

我们可以觉察到,野蜂的意象怎样由主体的诗意思象变为了意象客体的叙事化呈现,具有了明显的戏剧化特征,这不同于一般的少数民族族性诗歌意象,前者以对家园的迷恋赞颂情感诉求为目的,而在阿库乌雾这里,是以复杂的现实经验呈现为旨归,这是阿库乌雾诗歌意象策略达成的一种现代性变革。

三、“雨蛇”:心灵幻象与精神真相

按照列斐伏尔的都市空间理论,都市空间以现代工业和商业文明为形态,在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下,慢慢充满各种异化症候。作为城市空间的物理结构,现代建筑的材料取于自然界,但在加工和生产中脱离了自然属性,成了自然的异己,它不是肯定自然,而是不断地否定自然。城市便是从物理形式和文化形态都趋于支配性的、征服性的、控制性的封闭空间。人制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影响人,在都市里,人工环境和人工制造物不断地反过来吞噬着人的灵性。“玻璃”作为一种精神似乎内化于人的存在中,于是似乎到处都有看不见的“玻璃机制”桎梏和隔绝着人,同时“钟摆意识”也内化于人,在每个人内部安装上了发条。“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在自然界受到摧残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欧洲文明就是沿着这个途径过来的”^[5],而人类的生活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于是现代人在都市空间丧失了自我的根性,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压抑,渴望着突破。而对于内在情感习惯仍然保留着传统空间心理特征的少数民族来说,这种感情冲突就更加持久而强烈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单质的抒情性传统难以介入这种复杂的都市体验,他们除了流散的感伤和对前现代空间

的追忆之外,几乎找不到有效的审美话语来直视和对抗这种都市的异化语境。阿库乌雾在持久的不断对城市的书写和体验中,也寻求着精神上的倾泻和释放,当传统文学资源里的意象不再能够表现主体在现代性空间里复杂而独特的感受时,诗人凭借超常的想象力,以直觉联想或超常想象进行隐喻思维,结合心灵的直觉,现代的情感体验,在灵感闪电的刹那,对客观事物的某些感性特征对应起来,发现或建构他们间的相似性,加以变形,以新奇的构造方式传达诗人的情意,创制了许多具有民族根性和现代性的超现实意象。“雨蛇”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意象。

“天降大雨,生根的蛇柱”^[177](《雨蛇》)雨水作为仍然能进入都市人工空间里并且能带来影响的大自然力量之一,它对城市按部就班和机械重复的生活进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止和阻碍,雨水的深处闪烁着自然性和宇宙性,均等地沐浴着万物,具有某种微弱的洗礼感和救赎感。这里诗人所指出的“生根”的意识,正对应着人脱离了自然之“根”,在都市空间的漂泊和无根的异化状态,雨和人都曾是自然体系的一部分,但是人在都市空间却物化了,失去了与自然、大地、宇宙的密切联系和参照,于是丧失了自己的意义和方位感。

蝮蛇猖獗的年代离开画面,画面之外,城池如蝇蚁,盘错交织的街巷开始让人兽丧失方位能力,雨蛇,最后的稻草,紧紧地连接我梦中一黑一白的飞毡^[177]。(《雨蛇》)

“蝮蛇猖獗的年代”意即生命性、人性和神性纷繁涌动的年代,而现在只留下人工城市“城池如蝇蚁”。“雨蛇”,由独立的两个名词“雨”和“蛇”复合而成,雨变成了对蛇的状态:雨构型的蛇。无论“雨”或者“蛇”,作为独立的自然意象已经过于浅显,空泛和单一,无法承担复杂的感受指向,无法进行现实的指涉,于是在强力的现代情感冲突和诗性直觉中,带来了物种的变异。按照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里的见解,在原始思维中,宇宙是一个共同体,人与自然,不同类型的生命、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等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内在具有通约性,事物之间的是可以突破界限的,因此各种事物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蛇,天生有飞禽的基因,正如我天生有汉人的血统”^[177]。这里不仅反应诗人以民族性原始思维来参与文本的建构,更能看出诗人超越诸种现实区隔的广阔人文立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万物互渗、同型同构”的思维,使诗人不

仅在暴雨中看见闪闪的巨蟒,更认识到两者都是那种神秘的、广阔的、永恒的自然力量的体现,“蛇”和“雨”是同构的。于是雨和蛇复合成一种幻想的“雨蛇”,这种动物和气象之间的僭越和构型,使雨获得了蛇的蛮力,蛇亦有了雨水的灵性和暴雨的磅礴。“雨”作为原型的意义被程亮了,它带有新生、闪亮、滋润、生命力以及自然的循环等意味,而蛇,带毒,亦可药用,寓意神秘和危险,蛇亦可为“巨蟒”或者“龙”,蛇在这里作为“龙”的降格物出现,呼应着龙的巨型和力量,这种陌生化的幻想意象,体现出了诗人的思辨精神特质。诗人以他奇异的灵感创造力,在这个充满异化的空间带来了一些救赎性的审美期待。

蟒蛇的蛰伏,陌生,异质和毒性的形象,是诗人的阴沉焦虑情感的投射,暴雨的力量寄托着诗人的力量。此刻,暴雨如注,是某种对桎梏,钟摆意识的城市的覆盖和冲击,是压抑许久的生命的宣泄,诗人对自然元素以畸变的方式展开了新形象的再生。

我的意念盘缠着,攀附着,顶破我的茅屋,撑起大字,有大字可撑么?异想天开一朵夜来香^[177]。(《雨蛇》)

诗人的情感激烈地奔突,暴雨和巨蟒似乎使诗人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肆意狂放,一种急迫的节奏贯穿句子之间,几乎来不及喘息的语气。因此,雨蛇在诞生之后,开始表现生命迸发的四面奔突的高蹈,能量的爆发,在上天入地,在喘息,在大口呼吸着自由的气息。长短错落的诗句和繁复密集的形象,带出一种令人震惊的爆发力,抑扬顿挫,疾风暴雨般的急促节奏,我们感受到里面有某种传统神巫意识和宗教仪式的印记,给诗歌带来崭新的语速和节奏:“雨蛇,冲濯我,浣洗我,我定能以冲濯和浣洗的方式来安身立命。雨蛇,吞食我,咀嚼我,我终会在吞食与咀嚼中脱壳。……蝴蝶,蝴蝶,我的情人,我的粮食!雨中有毒,这些裸体的雨毒,一定不会是蛇毒。神力无边,破柱取恶灵,形似弹头,又具旺盛生殖能力,妙!”^[177]。

生物作为镜像反映出人性在都市空间的苟延残喘。这种幻想的意象(或“意象的变异”)的创制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扩大并深化了人类对都市的感觉能力,缓解了人们心理对都市的焦虑,带来了微弱的宣泄和休憩。它使想象力与感受性重新复活。它的对立面正是人的自我处境:在都市的人工钟摆意识中,变成一种对感受性的控制与压迫。“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

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统一”^[6]。诗人通过“雨蛇”这种心灵造像,来表达人在现代语境里的精神真实,意在提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生命必须摆脱物化和桎梏,重新获得诗意存在和自由。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7]。在传统空间中会有美好的明亮温暖的田园抒情意象,而在异化的冷漠的工业社会,则会培育出复杂多变的抑郁恶之花。如果说卡夫卡在西方的世纪困境中创造出了人和甲虫混合体的衰弱的“格里高尔”,那么今天,在我们面临相似的压抑和异化的时代背景里,少数民族文学因为灌注了民族文化的“精气”和“元气”,更有可能以文学的内在审美机制结合独特的创造力实践更富有民族生存精神和现代艺术审美的符号创造。这是阿库乌雾的“雨蛇”“鬼蝶”“船理”等带给我们的启示。诗

人所建构的都市民族文学空间,也将催生出许多融民族性和现代性为一体的充满异质的意象,给单质消费文化的都市空间进行了重新编码,灌注人性和自然的意义,“雨蛇”的灵动、自由、活力,淋漓酣畅,在《混血时代》的整体艰涩、分裂、凝滞的风格中形成了独特闪亮的一章。

阿库乌雾的写作以现代性审美对传统文化意象进行转译和重铸,让传统文化谱系的符号从意指单薄的传统原型意象转向现代流动多变“镜像”,对族群历史记忆(传统遗产)和现实个体遭遇(都市生存)进行了多重的投射,实现了传统审美符号与现代经验情境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同时激活“野蜂”与“翅膀”的现代意义,体现出精神突围的现代性寓意。阿库乌雾的这种意象策略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意象由抒情性转向叙事性的现代性变革,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都市写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范式。

注释:

- ① 在希腊神话的这个关于飞翔的寓言中,伊卡罗斯(Icarus)本是最聪慧的艺术家和工匠第达罗斯(Daedalus)之子,第达罗斯奉命在克里特岛为国王迈诺斯(Minos)建造了神奇的迷宫,里面有凶猛的半牛半人怪兽迈诺陶(Minotaur)。后来,第达罗斯失宠,他和儿子被迈诺斯先关在迷宫里,又囚禁在沿海的一座石堡中,他和儿子把剩饭留下来诱捕海鸥飞入高塔,然后耐心收集它们的羽毛,同时还在蜡烛燃烧时收集蜡滴。其后,他用羽毛、线和蜡滴为自己和儿子各自黏制了一幅翅膀,准备飞向自由,替儿子绑翅膀时,第达罗斯警告他不要飞得太快或太高,以免蜡滴被阳光融化,但是伊卡罗斯着魔般飞向了高空炙热的太阳,希望能够触摸烈日,任其羽翼融化燃烧而不顾,最终悲壮地堕天坠海而亡。这无疑是一个和少数民族文化人“精神游子”高度契合的寓言。

参考文献:

- [1] 阿库乌雾.混血时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 [2]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天马出版社,2001.
- [3] 邹建军.现代诗的意象结构[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 [4] 姚新勇.“家园”的重构与突围——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J].暨南大学学报,2007(5).
- [5]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简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
- [6]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7]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8]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9] 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10] 马克·本德尔.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歌[J].民族学刊,2013(5).